

东吴名家·周闻道

# 从理论探寻到文本实验

——周闻道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

孔明玉 冯 源

**摘要：**在场主义散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也是一个独特的散文创作现象。它有着何种样态的理论发现与美学引领，又富于怎样的创作实践意义，这是文学理论工作者理应深入关注的。在场主义理论构建由周伦佑担纲，作为命题提出者和流派创始人的周闻道，更显现出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本文以周闻道的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与文本实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理论文本《发现的秘密》的解读与分析，对其散文文本《边际的红》《七城书》《庄园里的距离》等的探究与阐释，旨在揭示这种独特散文创作现象生发的诸多缘由，凸显其具有的散文理论价值和文本实验意义，特别是深含的美学内蕴。

**关键词：**周闻道；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与实践；意义与价值

2008年3月，周闻道、周伦佑、郑小琼、张生全、沈荣均等全国18位散文作家，以大胆创新的探索精神，在“天涯社区—散文天下”隆重推出《散文：在场主义宣言》，有意识地将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主张与美学观念昭告当代中国文学界。随即引发的社会反响是非常强烈的。其中，既有支持、欣赏、赞美的声音，也有反对和质疑者，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淡然的姿态。尽管整个文学界的看法和认知不尽一致，但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已然置于创作界、理论界面前：它既是出现在当代中国散文创作领域的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同时也标识着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自觉的散文创作流派的诞生。因此，它引

起了广泛关注。

近20年的时光匆匆而逝，关注没有退潮，思考更趋理性。回望“在场主义”走过的曲折历程，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以厘清它在散文和文学理论、散文美学方面的努力、构建和贡献，以及探讨如何将这些理论付诸具体的创作实践。这不仅是一名文学理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也是衡量其是否具有“在场”意识与担当精神的有效方式。

通过对在场主义散文发展历程及其整个作家群体创作态势的梳理，我们可以见知，作为该流派的创始人、倡导者、创作主将的周闻道，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对在场主义散文进

行理论勘探与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哪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美学思想?这些观点与思想源自怎样的哲学、美学基础,对作家的文本实践又有着什么作用和影响?这一连串接踵而至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明确回答。正是有鉴于此,本文以周闻道对在场主义理论的深入探寻与全力构建,以及他在散文文本实践中卓有成效的尝试为分析和论述的重点。

## 一

从业已掌握的有关资料看,周闻道对在场主义散文理论的探寻与建构,都是围绕其流派纲领——《散文:在场主义宣言》的理论体系和审美本位进行的,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论评论著述《发现的秘密》里,如《在场的旗帜是介入——“在场散文书系”总序》《在场刍议八则》《散文的在场、思想、诗意和发现》《在散文性中发现意义》《苏轼散文的在场精神》《在场主义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转型》等,皆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理论篇章。从总体上看,这些文章的理论指向明确而具体,既有对在场主义散文理论的基本含义、主要特点的分析,又有对其具备的美学、哲学思想内蕴的阐释;既有对介入意识、介入重点、介入方式等在场精神的彰显,又有对散文性的理论探寻与文本实验;既有对苏轼散文中隐含的在场写作灵魂的直接指认,又有从历史维度进行的对现代散文在场思想的深层梳理。由是而论,这些篇章旨在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在场主义散文理论进行阐发,寻求不同维度、程度的理论探索意义。

《在场的旗帜是介入——“在场散文书系”总序》一文,虽然不过是作者为在场散文系列丛书所作的序言,但其中展现出的理论思想,对于在场散文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引和参照意义。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首先对“介入”一词进行了深入的诠释,认为这个语词实际上包含着三层含义:其一,它不是停留于事物与事件的表象,而是深入地插进其内层与深层;其二,它不是对人的消极被动行为的指向,而是需要人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出击;其三,它表现出非常明确而突出的“干预”功能和作用。在这个基点上,

文章着重论述了创作主体的介入意识、介入对象、介入方式,以及主体所具有的意义蕴含。在作者的深层认知里,一个在场作家是否具有强烈的介入意识,以及介入的对象、方式是什么,不仅取决于这个作家对当下现实的态度,更涉及他或她所具有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意识。作者认为,介入意识就是写作者从厚实而丰富的生命经验出发,以敞开的胸襟、坦然的内心、本真的灵魂,拥抱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世界,并充分体现出必需的关注与关怀。这是在场写作的使命意志,更是在场散文的责任与担当。至于介入对象,毋庸置疑的是当下的现实存在。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处于现实的怀抱里,现实的生活与人生、缠绕与纠结、矛盾与冲突等,皆会对我们“此在”的生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作家,在面对现实时,要么主动介入,要么采取逃避态度。由是而言,一段时期以来的写作状况,显现出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的不少作家,似乎更喜欢古典文人式的儒闲优雅,更接近庄子式的逍遥。这种看似出世、超然的精神状态,与时代严重疏离;而且,由于它对现实的逃避,对场的缺席,必然与本真的方向背道而驰,结果是走进精神的牢笼。”<sup>①</sup>显而易见,对于这种文学创作现象,作者给予了坚决的否定或者批判,认为它不仅无益于表达现实,更有违于在场散文的审美精神。文章最后着重指出:“在场的旗帜和使命是介入。介入让作家找到了精神的皈依,也让在场写作拥有了无穷魅力和多种可能。加上我们的包容、友善与责任感,我们的前景是无限开阔、光明的。”<sup>②</sup>这既是作者撰写文章的真实意图的显现,同时也是其对在场散文寄予的厚望。

任何理论皆是内涵与外延的统一,内涵乃事物本质属性的彰显,外延为事物所属范畴的表现,两者融合才得以构成所谓理论。在场主义散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场刍议八则》是最为有力的回答与确证。仅仅从这篇文章所取的标题来看,我们便会有一种通透的理性把握,在作者的理解和认知中,“在场”就是“在场主义”

①② 周闻道:《发现的秘密》,第3、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

的思想内核,就是在场散文作家努力追求和实现的终极价值。由是,这是一篇富有价值尺度、理论品格和探索精神的力作。

那么,在场的“场”的确切含义又是什么?如何从“场”出发?我们应当关注场量的哪些内在与外在变化,才能抵达对象世界与在场主义散文作家内心和灵魂的本真,最终实现对思想意义的深刻揭示、对存在真相的真实呈现。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场”作为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可以细分为能量、动量、质量三个矢向,它是维系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现实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依持。在《在场刍议八则》中,作者首先指出,各种各样的场无处不在,自始至终,它与人的现实生存息息相关。诸如自然界的电磁场、引力场、植物场、动物场,以及人类社会的官场、商场、情场、名利场、案发现场,等等。一个在场主义散文作家意图从本质上把握这个世界,最直接而有效的方式就是从场出发,以真诚的情感和内心、真实的思想和灵魂,无限贴近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人类;又并非仅仅止于此,应当充分明白从场出发的目的,既不能信马由缰,也不能想入非非,更不能视而不见。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场量的发展与变化。这势必涉及在场作家对题材的选择,对意义的发现,以及运用何种艺术手法书写与表达。有的作家热衷于小桥流水、风花雪月,对现实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一概采取避而远之的策略;有的作家则深切关注大众、民族、国家的当下生存状态,体现出主动介入、积极干预的责任担当。很显然,在场写作的精神指向属于后者。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存在意义的揭示,是这篇文章论述的另一个重点。作者指出,在场写作从来不回避自身的目的:对存在意义的揭示。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它的存在意义具有复杂性、变化性、多维性的特点。对于在场主义散文写作而言,这既是经历危险的过程,又是铸造幸福的必要手段。因而,任何一位在场主义散文作家,必须富于朝圣者的情感、内心、灵魂,以全力揭示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意义。

何为散文的“散文性”?在散文性中又如何发现现实、社会、人类、世界存在的意义?这是《在散文性中发现意义》一文所探讨和阐发

的问题。欲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国散文的历史发展与流变进行梳理。在作者看来,中国散文的源头为“说话”,最早的流传形式为先民的古歌谣,如《弹歌》等。从源头顺流而下,无论是先秦时代诸子散文的百花绽放,两汉之间历史散文的重新崛起,南北朝小品文的一度盛行,还是唐宋八大家散文所抵达的艺术高度,明清时期众多散文流派的纷纷涌现,及至《古文观止》里面收录的绝大多数文章;也无论是描述自然物象、历史事件、神异故事,书写个体人生、社会现实、时代命运,还是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与表现技巧进行创作,其中皆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蕴含和程度各异的散文性。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所谓散文性,就是散文区别于其他文体样态的本质属性。文章进而指出,在场主义文学观念与写作实践,不仅发现了散文的艺术指征——散文性,而且在散文性与意义发现之间建立了顺畅的通道。怎样才能散文性中实现对意义的发现?作者认为主要通过四种方法或途径,即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非体制性的散文创作。非主题性写作的重点在于:散文作者在创作之前,无需预先设置确定的主题或中心思想,而要依持自然而然的有感而发。只有富于这种情感自然、内心随意、灵魂纯粹的本真,才能发现独特而深刻、广泛又恒久的意义。那种主题先行的写作方式不仅显得僵化俗套,也有违散文创作规律。非完整性写作尤为关注作者的片段经验,主要原因是散文创作大多始于这种片段经验或细节,因而无论是在素材取舍与题材选择上,还是在主题凝练与思想凸显方面,理应以对片段经验或细节的切入为主,并进行逐步扩展和深化,以抵达深刻而透彻的写作目的。由此而论,非完整性的散文写作,既是对宏大叙事的摒弃,又是对全知全能的拒绝。非体制性写作则非常强调作者自由精神的创造。从本质上讲,任何写作都是自由精神的表达,但在具体的写作中,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体制因素便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作为散文写作者,一方面,要充分展示自己的直接经验与内在感知,竭力彰显自由精神的创造和建构;另一方面,既要拒绝体制不同程度的介入,又要与体制保持有距离的友善关系,这是减少或排除

体制因素影响的关键。综上所述,这种理论表述虽然仅仅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却是他发自肺腑的真心话。

《苏轼散文的在场精神》和《在场主义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转型》两文,从文学批评视野出发,以中国古代散文的作家个体、中国现代散文的转型为主要观照对象,分析其具备的在场主义文学精神,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理论韵味和意义。在苏轼的散文艺术中是否蕴含着在场主义文学精神,无论是渊深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是纷繁的文学理论界,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在苏轼进行文学创作的时代,“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已然成为广大为文者根深蒂固的主流思想。尽管此后的文章在散文的艺术表达上有所丰富,都不过是对这种文学观念的延续和深入,并未在本质上显示出应有的突破和创新;即便到了现代、当代,伴随着不断翻新的文学观念的纷纷出现,林林总总的散文现象和艺术风格此起彼伏,散文仍无大家公认的美学范式。因此,从漫长的文学史角度审视,作为富有当代意义的在场主义文学观念就像一股清流,令人耳目一新。由是,作者一直秉持自己的在场思想观点,或谓之迥异于众多学者的见解和发现,认为苏轼理应是一位在场写作的典范,以其创作的大量作品为例证,从介入力度、精神深度、发现难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意在揭示苏轼散文蕴含的在场写作元素,并特别指出:“苏轼的散文是在场的,无论阐明朝政时事、治国安邦,还是状写山川风物、天下景象,他都自觉地坚守介入姿态,高屋建瓴,洞幽烛微,发现表象背后的当下元素、人间真理、时代意义。”<sup>①</sup>这既是《苏轼散文的在场精神》一文表达的思想主旨,又是作者理论思考和探索精神的有力呈现。

相对而言,《在场主义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转型》一文更侧重于对现代散文转型,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对当代散文转型的梳理。作者认为,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勃然兴起的新散文运动,还是散文由抒情而文化的次第发展,抑或散文从审美到审丑,再到审智的逐步演变,它的每次转型,都蕴含着不同程度的在场主义文学观念,这不仅是对在场文学思想的呈现,也是对在

场文学精神的传扬。特别是其转型的内容:由“小品”转向“大品”;由关注个人狭隘的内心世界,沉湎于小桥流水、风花雪月,转向关注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关切;由枯尸里拔金牙、到外国去摘月亮转向关注当下身边的痛,更是对在场精神的生动诠释。

当然,上述两篇文章表达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见地,尽管显露出些许“强制阐释”的意味,但莫不是作者理论探寻个中所具有的独特理解和认知。就这个意义来讲,作者的这种理论探寻富有独特的精神蕴含和价值,这无疑是对在场主义散文和文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从如上分析和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作者对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描述,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判断和定论:“在场性”是在场散文的哲学本体,“散文性”是在场散文的文体本体,“介入性”是在场散文的方式方法。这三个方面不仅是在场主义散文内部系统构成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本质的显现。作者的这番理论描述是对在场主义散文内涵与本质的揭示,彰显出其较强的问题意识,又展现出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哲学蕴含,对在场写作也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者的这种理论描述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和不足:一是缺乏系统严密、精深高瞻的理论思考和探索,二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实证主义的意味。对于一个创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缺失,但对于一位散文作家来说,我们可以给予其充分的理解和宽宥。

## 二

从文本实践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和系统评价在场作家的散文创作,既是一个文学理论工作者思维方式和基本策略的呈现,又是其有效方式和具体手段的施展。如何选择作家作品,将其作为分析和评价的重点对象,采用什么思维形式、批评方法才能准确判断和揭示作家作

<sup>①</sup> 周闻道:《发现的秘密》,第4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

品的审美价值,这是文学评论者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思考,笔者以周闻道的散文集《边际的红》《七城书》《庄园里的距离》为主要论述对象,力图通过对这些散文集的理论分析和深层探究,努力发掘它们对在场主义文学观念、思想意涵、审美精神的承载,以及其特有的文本实践意义。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这三部文集皆具有“在场散文”的明确标识;二是因为它们是在作者在场写作的代表作品,富于某种范式意义和特殊价值。

在对周闻道在场写作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从当代散文发展史的角度进行梳理,以把握在场主义散文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中,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sup>①</sup>、李晓虹的《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sup>②</sup>是卓有学术见地和特出理论价值的两部论著。前者主要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当代散文在50年的时间内历经的丰富发展征程。其中既有对散文艺术外部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又有对散文创作内部构成因子的透视;既有对散文思潮、艺术流派、审美风格的勘探,也有对散文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要论。整部散文史论体现出开阔的视野、包容的思维、开放的胸襟和宏大的气势。后者侧重从共时性角度出发,以散文本体、艺术范畴、文本阅读、作家作品等为主要论述对象,不仅着力分析了散文的诗性本质、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文本语境和日常生活语境、自由抒写程度等,还较为深入地探究了散文研究的新视角、散文阅读的历史性与建构性、散文读者的期待视野等,展示出对当代散文审美建构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在上述两位理论家的著述里,没有任何关于在场写作的文字表述,根由在于这种散文创作现象发生于他们的论著出版之后(“在场主义”2008年才正式宣告诞生)。不难看出,在场写作是21世纪以来发生的散文创作现象,是富于创新意义的散文美学思想,或者说是突破传统散文观念禁锢和辖制的艺术力显。好在,21世纪以来,这方面已有补缺,包括中国南方系大学的现当代文学特色教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散文现象》《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四川当代散文史

论》等,都对“在场主义”作出专门章节论述。<sup>③</sup>

从某种意义上讲,周闻道的三部在场主义散文集,正是对这种富于创新意义的散文美学思想的创作呼应和有力呈现。在《边际的红》的封面和封底,该书的责任编辑皆有文字评论:这是一部“‘在场主义’的实验文本”,它以“关注当下的介入姿态”和“精神自由的健美体操”,找寻到“汉语回归的存在方式”。<sup>④</sup>这些文字明确地告诉读者,这是一部具有浓郁在场写作实验性,或者说充满创新、探索意味的散文集,意图通过对当下社会存在卓有成效的介入,深入开掘汉语潜在而巨大的活力,以唤起写作者关注当下现实的信念。

从文本细读和审美感知的向度看,它确乎是一部具有实验意义的在场写作散文集,同时又是关于自然世界、红尘社会、哲理思考、人生行走的叩问与探索,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情感、内心和思想介入。其中的《冬日意象:风霜雪雨》《边际》《躺在床上,让思想如此缠绵》《城市即景:街头巷尾醉了麻雀》等篇章,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风霜雪雨是冬季的四种典型气象征候,它们给人的生命带来怎样的体验、感受和认知,这是作者在《冬日意象:风霜雪雨》中意欲诉说的思想主旨,也是这篇散文审美关注和艺术表达的重点。风霜雪雨给人带来寒冷透彻、浸入骨髓的生命体验。为了表达这种生命体验,作者有意识地勾连和缀合少年、青年、中年时代在冬天发生的诸多往事和点滴记忆,其中既有父亲的谆谆教诲,又有生命的切身感受;既有关乎乡村的体认,又有关于城市的理解;既有对细枝末节的

① 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② 李晓虹:《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③ 陈剑晖主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散文现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唐小林主编:《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孔明玉、冯源:《四川当代散文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④ 周闻道:《边际的红》,封面、封底,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关注,也有对局部与整体的审视。倘若把这些内在感受、体认、理解、审视予以梳理,不难发现,这是作者对冬日意象的独到见识,或者说是不同程度的情心介入。

《边际》侧重于表达作者思想介入的深度。这种富于深度意义的思想介入的产生,既与一句广为流传的农谚有关,也与作者在少年时代生发的朦胧认知密切相关。这句农谚为“寒露胡豆霜降麦”,它引发了一个少年的朦胧认知,生成一幅农时节令情景——秋收后的田地正处于小憩,播种是在来年的春天,从秋季到春季的这段空隙里,农作物是怎样生长的,又将朝着什么方向生长?这犹如一个巨大的谜团,吸引着这个少年对农耕、流年、生命、日子的翩翩浮想。随着生命的渐渐成熟,特别是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作者深刻地意识到任何事物间都存在着一个边际问题:无论是在生长与死亡、个体与群体、乡村与城市之间,还是在国家与民族、人类与大地、世界与宇宙之间,莫不如此。正是对这种由形而下到形而上问题的分析与探索,力显出作者对于当下现实的思想介入程度。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有力度、有深度的生命介入,不仅展现了作者对当代现实的深切关注,也传递出深层的思想蕴含。

散文集《七城书》由“经秋植物”“官场词语”“七城书”“自然与人”“智慧的地址”等辑组成,“七城书”是书写与表达的主要对象或思想内容。在《七城书》里,作者分别叙写了迷城、空城、蛊城、玻璃城、危城、欲城、皇城,显而易见,这是通过象征艺术和魔幻手法的运用,意在展示作者独树一帜的城市命名方式,以及对城市生活与人生的介入程度。散文评论家陈剑晖指出:“以城命名的系列散文《七城书》,更是‘存在之思’的范本,同时也是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标志性作品。”<sup>①</sup>这是他作为散文评论家的肯綮之言。

在此,我们不妨以散文《迷城》《空城》《危城》为例证,深入透视作者在这些篇章中表现出的对城市生活与人生的独特体验、感受和认知。《迷城》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了“我”在城市中的迷茫和迷失,特别是感受到的无所不在的生命压抑。“我”从乡村来到城市,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自从进入城市的那一刻起,便完全而彻底地迷失了自我,既不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深深怀疑自己不过是一串数字符号。让人迷茫的是,当“我”踏入“迷城”,犹如走进了一座由钢筋水泥、高楼大厦、声光噪声组成的纷繁杂乱的迷宫,而那条最拥挤、最宽敞、最豪华的大街,以及那幢高高耸立于街道尽头的政府大楼,更令人感到某种有形又无形的重压。从这番审美描述里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深刻而新颖的独特体验和感受。在他看来,所有的城市都仿佛深邃的迷宫一般,不仅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受,也会令人陷入迷失之中。这是作者对转型中的城市的独特想象和理解。《空城》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对城市进行书写和表达,但作者笔下的这座城市显然不同,它最显著的特征是:看似具有浓郁的现代韵味,无论是机械化程度,还是网络化管理水平,皆可以成为力证,但在本质上却是一座“空空如也”之城。人们不知道这座城市姓甚名谁,报纸的报头没有编者和日期,夜总会的舞台没有报幕员和演员,图书馆里所有的书没有章节和页码,甚至市民大会的会场也是空空荡荡。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它是一座空洞之城。相形之下,《危城》中的叙事则显得更为吊诡。城市中心的一块巨石发生位移,直接威胁到民众的交通出行和人身安全。市政机关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却毫无办法,致使这座城市的民众更为紧张,乃至生发出极其恐惧的心理,进而引发读者对城市、权力、物欲、人性的思考。通观上述三篇散文,它们在思想内容的艺术表现上,皆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即通过奇异而非凡的想象表达作者对城市的思想介入程度,揭示城市的当下生存现状;从艺术表达的角度看,主要采用象征、魔幻手法隐喻转型中城市的迷乱、空洞和危机,既恰到好处又显现出不凡的艺术功效。

散文研究者祝德纯曾评论称:“参悟寄托是指写作主体在现实人生的特定状态中,或者是自然外物特定情境中,发现、领悟到带有某种普遍性意义的道理,或者哲理,然后通过特定物

① 周闻道编:《介入的力量》,第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

状的描述,寄意寄理地表现出来。这样,就使得所写的散文文本带上了一种理性和理趣。”<sup>①</sup>表现理趣意味或哲理蕴含,的确是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对于不同的散文作家而言,存在不尽一致的表达方式。周闻道在《庄园里的距离》里的艺术表达,就是从历史视野出发,从容地进入古往今来历代哲人的内心深处,以灵魂感知灵魂的方式,充分运用历史、哲学中与现实具有隐秘关联的“灵魂在场”,通过对其社会场景、生活细节、哲学思想发生过程等的描写,力图抵达思辨性、学术性、文学性相互融合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境界。

在极为丰繁的世界文化史上,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既是闻名遐迩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又是声誉显赫的文艺批评家,其主要著述《精神哲学》《美学原理》《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都曾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面对人类文明史上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散文艺术应该如何表达,才能凸显它的独特意义和审美价值,作者在《想象克罗齐》中运用的表达方式,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深切感知这位历史人物的心灵。作者首先认为,克罗齐之所以能够从对宗教的盲从和热爱,变成一位大彻大悟的反叛者,根本原因是发生于1883年的那场大地震,这也是形成其历史学、哲学、美学思想的基础。随后作者指出:在克罗齐的认知与发现中,“真理不过是这些概念的完美联系;而历史则是运动中的哲学。历史学不过是‘从众多谎言中挑选最像真理的谎言的艺术’;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本应是展示处于因果联系中的人,殊不知却夸大了我们对历史的无知。因此,历史应由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来编写”<sup>②</sup>。这不仅仅是对历史学的重新认知与阐发,更是对新的历史哲学思想的确立和昭示。文章最后,作者在对克罗齐的文艺美学思想本质,特别是其在具体的文艺批评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予以客观而公允的分析和评价。在《追寻德里达的流云》里,作者同样采取心灵感知心灵的方式,进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内层和深层。在作者的审美想象里,德里达犹如浩渺苍穹中的一朵流云,灵动而飘逸,洁净又深邃。这既是对德里达成功突围二元对立

论思想藩篱的颂扬,又是对其解构主义哲学精神的赞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者皆被二元对立论的思想所左右,认为这个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就是绝对真理的显现。然而,德里达用他独创的解构主义哲学,不仅轻易地摧毁了二元对立论的坚壁,也大大激活了人们的思想,使得这个世界充满灵性的流动。在作者看来,德里达就是这个流动的中心,仿佛一朵深邃的思想流云,成为其人生与理想的追寻。当然,以这两篇散文为分析对象,不过是探寻了整部散文集的冰山一角,更多篇什展示出作者关于历代哲人哲学思想的深层探索,或者说作者对于这些哲人思想和灵魂的深度介入。

笔者在这里特别要提及和论述的是《坐在上帝的花园看这世界》和《读你:没有眼泪的人是可怕的》两文所传递出的深刻思想意蕴。对于这两篇文章,我们既可以将其视为作者对这部文集的思想总结,也可以将其看作作者对另一种意蕴的开掘与升华,即当代人如何理解、认知和把握历代哲人的哲学思想,以及这些哲学思想对当代人的特殊意义。前者把历代哲人的哲学思想形象地比喻为“上帝的花园”,通过对童年时代的城市记忆、当下现实存在的梦境、阅读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猎人笔记》的感受、草原上羊群追逐情景的观赏等进行有意识地连缀,将它们逐步提升为一种清晰的大地意识或世界意识,认为历代哲人的哲学思想犹如大地一般,既苍茫辽阔又意涵深邃,无疑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的结晶。后者以“读你”为文章的关键词,意在凸显阅读、阅读对象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在作者看来,阅读是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也是提升人思想底蕴和精神境界的重要手段。阅读对象丰富多元,既可以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和现实,也可以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既可以是经典意义的哲学、文学、历史,也可以是一般意义的通俗读物;既可以是泛化意义的你、我、他,也可以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地和整

① 祝德纯:《散文创作与鉴赏》,第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② 周闻道:《庄园里的距离》,第15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1。

个世界。显而易见,作者首先重点关注的阅读对象是经典的哲学著述和人群中的你、我、他。他认为对哲学经典的阅读,就是对人、人类的全部理解和深刻领悟。无论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智者不求快乐”的人生总结,还是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昭明的“我思故我在”的思想精髓,或是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所指出的痛苦是生命的全部本质,皆是对人和人类存在普遍意义的揭示。在对你、我、他的阅读中,“我”处于不可撼动的首要位置,因为这个“我”既是“他”,又是“你”,至于能够读出怎样的思想蕴含和特出意义,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悟性和智慧。最后作者指出,阅读可以使人类的灵魂与哲学家的灵魂无限贴近,能够带领人类从狭隘走向广阔。这既是两文思想蕴含的深意,也是整部文集独特的审美能指。

综上所述,无论是《边际的红》《七城书》《庄园里的距离》表达的在场写作思想,还是其所展示的文本实践与探索意义,皆是作者对在场主义散文理论的自觉遵循。这对当下散文艺术的发展而言,无不具有独特的创作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以为,这种写作价值和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表现出散文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在场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更多的可能性有待作家的积极探索;其二,它证明了在场主义散文理论既是一种富于新意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又为散文作家的文本实践提供了参照。

### 三

青年学者张怡微指出:“我猜想,从创作、改编的角度来看,现代散文文体还能经历更多变化,这些变化并非偶然生成的,它诞生于社会,诞生于经济发展,诞生于复杂的当代青年文化之中。我们要理解新的文学现象,需要深化对跨学科视域下当代人生存处境的理解。好的文学,诞生于复杂。在万变中,又有不变,永恒的价值才是文学的根本所在。”<sup>①</sup>笔者以为,这位青年学者所说的“改编”,其实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改造与变易,二是开拓与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之所以能够在21世纪初

产生,且在并不太长的创作历程中,有力显扬出积极的文本实验意义,正是基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经济建设的迅速腾飞、多元文化态势形成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特别是其自身寻求变化与创新的结果。

那么在场主义散文在理论探索中彰显出怎样的变化与创新?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散文性”“在场性”“介入性”,既是在场主义散文理论表述的三个重要关键词,又是其完整理论系统的基本支撑。先说“散文性”。众所周知,散文性不仅仅是散文文体身份的识别标识,同时也是其本质属性的显现。当散文艺术抵达成熟的发展阶段时,无论是内容书写还是审美表达,皆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较高的思想与艺术水准。这个特征不言自明,成为散文创作群体共同追求的目标,以及历代散文批评家、文学理论家谈论的话题之一。但历代的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却从来没有自觉地从散文性的角度读散文、写散文、研究散文,而是纠结于碎片化的、林林总总的散文观念中,甚至“散文性”的概念,都是由“在场主义”首次提出,并将其作为散文文体识别的艺术指征。这是“在场主义”对中国散文的一大贡献。再说“在场性”和“介入性”。在场与介入是在场主义散文理论非常重视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散文作家对自然、社会、现实、人类灵魂的无缝链接;后者关注散文作家情感、内心、思想对万事万物的直接干预,以最终抵达去除遮蔽、呈现敞亮、展示本真的创作境界。仅仅是这样的提法,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更遑论其背后隐含的创新意识。然而,对于将西方现代文学与文论烂熟于心的读者而言,莫不知晓最早提出“文学介入”理论的是法国著名现代作家兼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该理论在他的《什么是文学》一书里有着较为详尽的阐述,并赢得了部分作家的积极响应。由此而言,在场主义散文主张的介入与在场,是一种“引入性”的理论表述:从西方现代文学角度来看,它显得有些过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它又充满了某种新意。当然,毋庸讳

<sup>①</sup> 张怡微:《散文文体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文艺报》2025年8月11日。

言,作者的这种理论探索存在自身的某些不足,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指出的,一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和高度,二是显露出实证主义意味。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作者加强理论学习,加大思考力度;对于实证主义则需要力避,因为它主要是从已有的人类经验出发,看待和分析问题,有一定的认知局限。

相形之下,《颠覆城堡·理论卷》一书中收录的文章,不仅表现出文学批评的深度,也展示出应有的理论高度。这部理论著述主要集中了国内一些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如孙绍振、范培松、陈剑晖、周伦佑等关于在场主义散文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其中既有对在场写作的理论透显、对散文文本的具体分析,也有将两者融合的深度阐发。在此,我们不妨以孙绍振的《在场主义与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范培松的《在场主义散文面临的三个理论问题》为例证,分析其对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探寻彰显出的独特散文研究意义和价值。

《在场主义与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一文站在21世纪初的时间点,通过对中国现代、当代散文百年来跌宕起伏发展历程的回眸与梳理,充分确证和大力显扬在场主义散文在理论建构方面的独特意义。如何才能厘清百年来中国散文发展历程,又如何看待它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起伏与曲折?这不仅涉及一个研究者所具备的系统性文学史知识,同时也关乎其是否富于超强的概括能力。在作者看来,中国现代散文发轫于周作人的美文之说。“美文”这个词的原产地为法国,周作人通过意译方式使之成为他发明的汉语新词,于是一个富有中国本土意味的文体名号——散文得以诞生;与此同时,周作人还规定了散文的基本特征是抒情与叙事,尤以抒情为主。很显然,这是对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主情美学传统的延续。周作人这种过于强调抒情的取向,特别是以“韵”为标准——有韵为诗,无韵为散文,不仅是一种片面的审美思想体现,更使得现代散文陷入相当程度的文体意识混沌,以致后来抒情演变成了滥情,小品成了小格局。接踵而至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杨朔、刘白羽、秦牧为代表的流意识形态散文创作,肖云儒提出“形散而神不散”<sup>①</sup>,80年代林非

倡导“真情实感论”<sup>②</sup>等,它们都是散文文体意识历经的起伏与曲折。

在作者的深层感知里,历史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余秋雨和南帆为代表的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等的涌现,使得百年来的中国散文迎来了根本性转机。余秋雨的散文并非一味地被动描写,而是选取有限性的突出特征,深度结合亲身体认的人文景观,进行双向互动的审美阐释,创造出具有人文意蕴的智性话语;南帆的散文充分汲取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突围”和“话语颠覆”,将理性主义思想转化为深沉的审智话语。正是由于散文艺术的这种由审美到审丑,再到审智的流变与融合,才催生了在场主义散文流派创立这一重大事件。因而,无论是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觉醒、散文性艺术思想的确立、呈现的表达方式,还是自由性、介入性、当下性、精神性、发现性等意涵的传递,都大大丰富了散文鲜活灵动的生命力,为散文发展拓展出更大的空间。透过这种梳理和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余秋雨、南帆对文学史知识系统的熟稔理解和不凡的概括力,为“在场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创作和思想启示,让“在场主义”的问世作为一个重大文学事件,有了更深的思想根源。

《在场主义散文面临的三个理论问题》一文既是对在场主义散文奖前五届成功评奖的总结,又是对理论问题的深度开掘和发现,体现出突出的问题意识。在文章的开篇,作者明确指出:“随着在场主义散文评奖的深入推进,一些理论问题也就浮现了……在我看来,一种文学创作流派的形成必须有三个条件和因素:一是要有鲜明的理论主张,二是要有领衔的作家,三是要有优秀的代表作品。以这三个条件来衡量,在场主义散文的流派形成还有很艰巨的工作要做。而当务之急,在我看来,在场主义散文理论建设显得尤为突出了。”<sup>③</sup>

① 肖云儒:《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

② 见林非:《散文研究的特点》,《散文百家》1985年第5期;《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③ 周闻道主编:《颠覆城堡·理论卷》,第150-15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作者主要从“在场主义”的思想与艺术批判、在场姿态的文化人性与品格、在场写作寻觅与开掘散文味这三个向度展开理论探寻。笔者在这里只就作者对第一个问题的论述进行探讨。与上文的思维方式类似,作者首先对现代散文进行深度观察与理论分析,认为现代作家对散文理论的总结明显地表达出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拒绝散文的功利性“言志”;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突出散文的社会作用。由于前者的散文观得到了大多数散文作家的支持和认同,遂成为中国现代、当代散文创作思想的主流;后者的散文观则因为不同的历史、社会、时代背景,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发展历程备受艰辛与坎坷。在作者看来,正是因为鲁迅强调散文的匕首与投枪作用,以及彰显出深刻的批判思想和深沉的文化品格,让散文作家看到了散文应当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时这也是散文的发展方向和希望所在。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深入指出,在场主义散文倡导的去除遮蔽,不仅是对以往散文创作中种种遮蔽行为的富有思想力度的批判,而且是将恢复和强化散文性作为己任的使命担当,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然作者也不否认,在前几届在场主义散文评奖活动中,像鲁迅那样强烈展现批判思想与文化品格的散文作品,可以说并不是很突出。由此而言,在场主义散文仍然面临着思想与艺术批判的问题,倘若轻视乃至无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散文流派的存在意义及其命运和前途,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作者的肺腑之言,更是他对在场写作的警醒。

由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孙绍振对百年散文发展史的梳理与厘清,范培松对新的理论问题的发现与开掘,还是他们对在场主义散文理论的清醒认知,对在场写作美学本质的深入洞悉,尽管看待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存有不同,但皆表现出一定的哲学、美学高度和理论深度,展示出文学理论家的不凡见地,为在场主义散文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从文本实验维度来看,周闻道在他的在场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实验意味。在《边际的红》里,作者主要突出对现实人生、当下社会的深切关注。在《七城书》里,作者侧重表现工业化、城镇化转型中城市的怪诞和荒谬、畸形和病态,以及城市人的危机意识、异化心理、空虚感、失落感、迷茫感等精神状态。在《庄园里的距离》里,作者凸显出对哲人的个体心灵、哲学思想的独特审视,不仅展示出对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与美学思想本质的探寻,同时也是对在场性、介入性、散文性富有成效的实践,这毋庸置疑值得首肯。从另一种角度而言,由于这三部文集都缺乏明显的标识——在场主义散文的特殊标志,致使广大读者难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读”或错觉,认为它们仅仅是作者对常态意义散文艺术的一种延展与深化。尽管这不过是读者的误解,却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即在场主义散文写作必须具有明确的标识,以此有力凸显自身的在场与介入。这理应是解决问题症结的关键。至于这种明确的标识究竟是什么,需要在在场主义散文作家群体进行深入思考和探寻。

漫长的文学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形态的文学理论生成和艺术主张,以及付诸文本的实验,都是一个从低到高、由简而繁的循环前行过程。这个过程或许充满曲折和复杂,或许显得一帆风顺,又或许是两者与共,但富于深层意义的思考和探索精神,是其独一无二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历经十多年摸索和发展的在场主义散文创作尚年轻,这也正是它的无限潜力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学评奖’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24BZW1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孔明玉,绵阳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地方文化与文学;冯源,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影视艺术。